

石鼓文秦襄公一说

· 陈少华 ·

石鼓文自唐初发现,历代考释者多达二百余人,留下文章三百多种。但在制作年代上各说其是,尚无定论。最有影响的有郭沫若《石鼓文研究》的秦襄公说;唐兰《石鼓文年代考》的秦献公说;程质清《石鼓文试读》的秦惠文王说。近年又有秦文公说多了起来。笔者崇尚郭沫若秦襄公说。石鼓文字记述的是秦襄公时代的事情,与《史记·秦本纪》秦襄公那段文字相符。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:襄公,庄公之子。庄公生子三人,长子世父。世父曰:戎杀我大父仲,我非杀戎王不敢入邑。遂将击戎,让其弟襄公为太子。庄公卒,太子襄公立。襄公二年(公元前776年)戎围犬丘世父。世父击之,为戎人所虏。岁余,复归世父。是年,徙居汧(《秦本纪正义》引《帝王世纪》)。七年(公元前770年)春,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,立褒姒子为適,数欺诸侯,诸侯叛之。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,杀幽王酈山下。秦襄公将兵救周,战甚力,有功。周避犬戎难,东徙雒邑,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公为诸侯,赐之岐以西之地。曰:戎无道,侵夺我岐丰之地,秦能攻逐戎,即有其地。与誓,封爵之。襄公于是始国,与诸侯

通使聘享之礼,乃用骝驹,黄牛、羝羊各三,祠上帝西畴。

石鼓文以诗的形式,记述的正是这段史实。

一鼓:“马荐”篇。

存“天虹”二字,“骐骐马荐,藉藉芃芃”句。说明雨水充足,水草茂盛,以利畜牧。出现彩虹,当在春末夏初。与《史记》襄公七年春季节合。这是秦襄公将兵救周的时节。

二鼓:“汧毆”篇。

襄公二年“徙居汧”。汧,汧水之源的汧源县三里的地方,即今陕西省陇县地域。襄公领兵从汧邑之蒲谷乡出发,沿汧水向下游行进。途中捕鱼携行。“漓有小鱼,其游趣趣”,上游水浅,踏石行进,见小鱼在水中散游。鱼捕多了,“何以橐之,惟杨及柳”,用杨柳条串鱼或编筐装鱼带走。

三鼓:“吴人”篇。

岐州雍县有吴山。吴下有人生息于此,称吴人。吴人为少数民族,对秦时有袭扰。而秦对吴人采取怜惜怀柔政策,“吴人怜极”,吴人对秦敬谨倍至,“朝夕敬□”。襄公出征,“献用”牲食,祭祀,“大祝”胜利,并随征“而出”,

● 陈少华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研究员

参与征伐。

四鼓：“吾车”篇。

参战人员不断增多，车坚马壮。“吾车既工，吾马既同”，襄公十分高兴。“君子云猎，云猎云游，麇鹿速速，君子之求”，襄公发令并带领部队围猎鹿群。“吾驱其特”，“吾驱其朴”。特，公牛；朴，尚未完全调教好的小牛。有人赶着牛车跟随队伍运送猎物粮秣。

五鼓：“銮车”篇。

队伍到达汧渭交汇处。“銮车”、“奉敕”，銮车中的襄公发布命令，点验兵马车徒，“蒲□宣搏，省车载行”，看看从汧邑蒲谷乡出发以来，实力增加了多少，有多少保障车辆能继续前行，宣布征伐精锐部队组成，并作下阶段征伐动员。“□徐如虎，兽鹿如□”，要求部队克服艰难险阻，勇猛精进，如猛虎追赶兽鹿那样，扑向战场，“吾获允异”，我必定获得胜利，绝无问题。

六鼓：“霤雨”篇。

“霤雨”，大雨。“流沓滂滂，盈泄济济”，“沂馭洎洎”。洎，添加水。雷雨交加，汧水入渭，流激水深，“徒馭汤汤，惟舟以航”，“极深以匹”。部队只好乘舫舟前进。有淹亡的马匹来不及处理，置于水边。勿“止其奔”，然勇士们为襄公救周之事，不间断地奔驰急驶。

七鼓：“田车”篇。

“田车孔安，鞶勒馭馭”。田车，轻车，即战车。战车列阵，待策即发。“吾以济于原”，我们的队伍集合于平坦的作战出发地。“吾戎世陝，宫车其写”，到达我周朝时代所有的陝地作战，保护平王和宫室所乘之车安全转移。陝，周初地名，今河南西部陝县所在地。陝以东属周公，陝以西属召公。陝地，也是襄公队伍护送平王去雒邑的必经之地。襄公部队作战勇敢，如猎如游，打得敌人如麇鹿野猪雉兔逃窜奔走。“执而勿射，多庶跃跃，君子乃乐”。对俘虏之兵民不射杀，征伐得胜，士卒百姓欢

呼跳跃，秦君襄公也欢欣异常。

八鼓：“而师”篇。

战事结束，“天子来□，□嗣王始”。继承王位的周平王来到襄公队伍前，检阅了胜利之师，封侯封爵，褒奖慰劳。“古我来”。古，故，襄公以兵送周平王来到雒邑。

九鼓：“作原”篇。

秦襄公得胜衔侯爵归汧，选择佳地“作原”，“作道”，辟原场，修道路，起池沼，建祠宇，立西畴。对新领地司行恩威并重的治理方法。

十鼓：“吾水”篇。

“吾水既净，吾道既平”，诸侯始国君秦襄公满怀信心地治理秦国，水净道平，一派升平景象。“天子永宁”，襄公祈祷周天子永远安宁。发誓“吾其周道”，按周朝礼制治理秦国，继续走富国强兵之路。

综观以往的石鼓文研究，偏重于文字字体考证，相当多的人认为石鼓文制作于公元前500—前300年。有的从字面上观石鼓“云猎云游”，把石鼓称作“猎碣”。有的拿石鼓文与《诗经》比，认为石鼓是仿《诗经》之作。笔者以为，在残泐严重的情况下，石鼓文研究不可完全偏重字，包括字体的研究；而应当以拓本可视可识的字为基础，去理解、把握石鼓文记述内容的意，包括可读字句的意思，各篇的意思，十篇总体的意思。切不可不连贯，孤立地理解各句各篇。因为十篇文字字体统一，必须从总体上把握石鼓文总体的意思，才能使研究接近石鼓文制作者的意图。从总体上把握石鼓文的制作意图，还要有历史的大事观念，看看在先秦时期，秦国发生过什么大事，值得制作十个大鼓诗文来纪念。不为某件大事，而费那么大事，做石鼓文有劳民伤财之嫌。笔者以为，石鼓文意合《史记·秦本纪》襄公时代的史实，是秦襄公时代史实的诗式的记述，其理由有以下几点。

其一,从周秦关系看。

秦国历史上与周朝关系最密切的只有襄公时期。襄公直接为周朝“奔其事”,将兵救周,以兵送平王东迁,平王为襄公封侯,赐地。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襄公在“诸侯叛之”,独家出兵去救周的,且“战甚力,有功”。襄公之前,未见史料有记载,襄公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事。石鼓文中“天子来”,“嗣王始”,只能是平王在平难后来看望襄公,襄公祝平王继位。可以想象,这种周秦的患难之交,战争刚结束之后的见面,是何等的惊心动魄,刻骨铭心,亲密之至?平王东迁之后,周室已不再具有控制诸侯的能力,形成了各诸侯国力政,称王的局面,哪个诸侯大国真正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呢?特别是到了秦惠文王,他是诸侯大国最后一个称王的。诸侯称王本身就不合周礼,是对周天子最大的不恭不敬,结果周天子还要派使臣去致贺,致文武胙。这是王道向霸道的屈服,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可想,这个时候的周秦关系,已无大的实质意义,即使秦惠文王称“天子永宁”,也不过是一句客套话而已,还有必要刻到石头上吗?襄公以后,秦国任何一个国君都无条件与周室患难与共,生死相依,所以石鼓文尽管残泐,还两处出现“天子”,这种对周天子的恭敬态度,除襄公,还有谁人?

其二,从田猎与征伐的关系看。

先秦时期,特别是春秋之前,是兵农、戎猎合一的时期。石鼓文中,反复多次出现的车马弓矢,既是农猎工具,也是征伐装备。石鼓文字面上讲的是田猎,而实质是在歌颂国富兵强。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(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)。石鼓文十篇诗,有七篇直接涉及车马弓矢,正是这种大事观念的反映。秦襄公将兵救周,出动了最强的兵力,最好的装备,“吾车既工,吾马既同,吾车既好,吾马既骝”,是有取得胜利的十足信心的表现。因为车马弓矢在石鼓文中反复出现,就把石鼓文称为“猎

碣”,继而把石鼓文说成是文公东猎,献公西猎的产物,仅仅为一次游猎活动,制十个刻石巨制纪念之,理由似不够充分。只有襄公将兵救周,边行军边渔猎补充给养,才是最合理的解释。

其三,从“汧毘”篇与“徙居汧”的关系看。

石鼓十个篇幅,以二鼓“汧毘”篇一个篇幅专写汧水风光秀丽,鱼产丰富。为何不写别的什么河水,单写汧水呢?这说明汧水不论是物产、地理位置对于石鼓文的制作者来说,有着特殊亲近的感情。这份感情,秦国历代国君谁有呢,还是唯有秦襄公才有。前已述,襄公二年“徙居汧”,在汧生活了12个年头去世,第六个年头时从此出发救周,在此获诸侯国的平等地位。汧地汧水,是秦国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。然史学界历来对秦徙居汧有争议,有的认为襄公未到汧建邑,是《秦本纪正义》错引了《帝王世纪》。争议归争议,近期考古新发现,为襄公徙居汧提供了证据。《人民日报》1991年11月24日载: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宝(鸡)中(卫)铁路工地的陇县殿子村西侧发现了200多座古墓葬,其中春秋战国时的秦人墓多达150座。报称:陇县是秦人早期从甘肃天水一带东迁入陕的所经之地,在此曾置城邑达14年之久。这次秦早期墓葬群的发现,再现了秦人早期活动的踪迹,丰富和弥补了史料缺环,对研究秦国早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丧葬制度以及对于秦国的分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。

其四,从石鼓文对车马弓矢的赞颂夸耀与古代车战兴衰时代的关系看。

石鼓十篇诗,有七篇言及车马弓矢。秦君对自己队伍中精良的车马装备夸耀赞颂无以至极。石鼓赞颂车马,因为车马是那个时代炫耀国力强大的标志。这个时代起于商周,直到春秋。到了公元前541年,晋国在一次作战中发生了“毁车以为行”的事件,这是战车为主

要作战装备开始走下坡路,改由步战为主的重要标志(蓝永蔚:《春秋时期的步兵》)。到了公元前325年,赵武灵王兴“胡服骑射”,废弃了过时的战车,改建灵活机动的骑兵。此后,各诸侯国虽然还保留着大量战车,但远不及步兵骑兵规模。从此,战车逐步退出了战争舞台的中心位置,成为了一个辅助兵种(李少一、刘旭《干戈春秋——中国古代兵器史话》)。车战兴衰史表明,以车马为标志炫耀国力强盛,当在春秋晚期之前。在此之后以至战国晚期,夸耀车马似不合时宜。另外,从车战指挥来看,春秋中叶之前,两军交战,国君、诸侯必须亲自乘车指挥作战。春秋中叶之后,军中出现了专职将帅,国君不一定登车指挥战斗。石鼓文极力赞美车马,且有“銮车”,“奉敕”记述,表明诸侯国君出征并发令指挥征伐。可见石鼓文言秦襄公事,更为合理。

其五,从石鼓文与《诗经》的关系看。

石鼓文有许多句子酷似《诗经》。最典型者如四鼓“吾车”篇“吾车既工,吾马既同”,与《诗经》“车攻”篇“我车既攻,我马既同”,几乎一样。石鼓文与《诗经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说石鼓文仿《诗经》,很有可能。问题是,在《诗经》成书之前仿呢,还是《诗经》成书后仿。据传,《诗经》为孔子收集而成书,时间当在春秋晚期,如此时以后石鼓仿,那石鼓时代当在战国。然孔子集《诗经》成书前,那些诗早已在各国流传,如《诗经》“车攻”篇,《毛诗序》说,宣王复古也。宣王能内修政事,外攘夷狄,复文武之竟土,修车马,备器械,复会诸侯于东都,因田猎而选车徒焉。《诗经》中,还有“常棣”、“黍苗”、“出车”、“采芣”、“杖杜”、“大东”等45篇,皆为周宣王(公元前827—公元前782年)时的诗作。(孙作云:《〈诗经〉与周代社会研究》)这么多的诗都早于秦襄公而存在,秦襄公时代仿完全正常。关于石鼓文与《诗经》

体裁、风格迥异的问题,石鼓文是记事体诗,确与《诗经》不同。作为记实文字,有时间,如“日惟丙申”,干支纪日,有“二日”、“五日”合文。有地点,如“汧”、“蒲”、“原”、“陕”等。有人物,“天子”、“君子”、“徒”、“庶”、“吴人”等。有“其事”,“猎”、“渔”、“涉”、“衍”、“奔”、“射”、“祝”、“猷”、“执”、“作原”、“作道”等。这种叙事完整的文字体例,颇似大型青铜器铭文,如西周早期的大孟鼎铭文,晚期的多友鼎铭文等。但在俘、获等数量上却不如铭文具体。可见石鼓文体裁、风格介乎青铜铭文和《诗经》之间,这是一种特殊,我们当接受它。不要轻易说仿造,乃至“假冒”。石鼓文是记实诗,时代不会太晚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称,战国已没有赋诗风尚。如果把石鼓文推到晚周,恐不可能(李学勤:《东周与秦代文明(增订本)》)。不然,仿编十篇诗,再刻到十个大石头鼓上去,何益?何意?

综上所述,石鼓文记述的是秦襄公时代的事,最为合理。至于十个石鼓刻制何时,按常理推断,秦襄公立西峙时,或是襄公卒,秦文公立是最佳时机。关于文字的时代考证问题,本文篇幅不宜多述,有机会另说。关于石鼓文秦襄公一说到此搁笔。

又,石鼓文秦襄公说,笔者于1988年曾有《从石鼓文看秦国富国强兵思想与后勤实践》刊载于《军事历史》杂志当年第6期。近年,持襄公说者几无。近读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《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》(见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5年第1期),颇受鼓舞,因为裘教授说,“平心而论,如果撇开字体的时代性不论,郭沫若的襄公说是相当合理的”。依此,遂有上文,畅表一家之言,以求教石鼓专家学者。

1996年12月6日清晨5时
三稿于京西友竹草堂南窗